

查士丁尼瘟疫的另一面： 地中海西部疫情与中世纪早期西欧 基督教史学中的瘟疫书写

康 凯

【摘 要】查士丁尼瘟疫是一场波及整个地中海地区的瘟疫，其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地中海东部。当代大多数学者对这场瘟疫的讨论集中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疫情，有关同一时期查士丁尼瘟疫在地中海西部地区的传播、发展以及西欧各地作家对这场瘟疫的记载讨论较少。本文将视角集中在中世纪早期的地中海西部，以执事保罗、都尔主教格雷戈里和比德这三位分居意大利、高卢和不列颠的中世纪早期作家对疫情的记载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中世纪早期西欧基督教史学中瘟疫书写独特的史料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考察瘟疫在地中海西部的传播情况及其对中世纪早期西欧历史进程的影响。

【关键词】查士丁尼瘟疫；地中海西部；基督教史学；瘟疫书写

【作者简介】康凯，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副教授(200234)。

【原文出处】《史林》(沪)，2022.4.176~183,221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世纪早期史学中的罗马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BSS017)阶段性成果。

一、查士丁尼瘟疫研究的兴起与被遗忘的地中海西部视角

发生于公元6至8世纪的查士丁尼瘟疫是地中海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瘟疫，也有疾病史研究者将其列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全球性瘟疫之一。^①这场瘟疫持续时间将近两个世纪，波及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东部和西部，对此后地中海文明的历史进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②

查士丁尼瘟疫的研究一度被学界忽视，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史学研究领域对社会文化史的关注，以及多学科交汇研究范式的发展，“疾病史”研究逐渐兴起，也促使学者们重新认识查士丁尼瘟疫。^③从研究领域上来看，当代有关查士丁尼瘟疫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拜占庭史学界。国内外的拜

占庭史研究者已经对查士丁尼瘟疫的起源、传播路径、史料及其对拜占庭历史的影响做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④

从地域上来看，研究者们对这场瘟疫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状况，这主要得益于拜占庭作家留下的丰富记载。尽管研究者们普遍承认查士丁尼瘟疫是一场遍及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大规模瘟疫，但是，有关同一时期这场瘟疫在地中海西部传播、发展以及西欧各地作家对这场瘟疫的记载，迄今为止讨论较少。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关注西欧中世纪疾病史的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史料较为丰富的14世纪黑死病研究上，查士丁尼瘟疫只是偶尔被当作黑死病研究的附加内容而顺带提及。中世纪医疗史学者比拉本在1969年与著名

的中世纪文化史学者雅克·勒高夫合作撰写了一篇较有影响力的论文,总结了此前考古学和医学研究领域对中世纪早期地中海西部地区大规模瘟疫的研究成果,并通过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中对疫情的描述确认当时高卢、意大利等地暴发的大规模瘟疫和当时地中海东部的瘟疫是同一种鼠疫,为查士丁尼瘟疫中地中海西部疫情的研究打下了基础。^⑤然而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并没有多少研究者对该论文进行回应或者补充研究。比拉本自己也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世纪晚期的黑死病研究上,他将该论文整合到了他撰写的中世纪晚期黑死病研究的专著中,但只是将之作为中世纪晚期黑死病疫情的参照。此外,该论文较为注重对考古学和医学数据的总结,并没有对中世纪早期西欧历史作品中有关疫情的描述进行专门的考察。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古代晚期”研究兴起,中世纪早期地中海世界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势。拜占庭史和中世纪史学者们开始脱离传统学科在地域视野上的束缚,将公元3至8世纪的地中海世界视为一个政治和经济交往密切的共同体。在彼得·布朗等学者的引领下,不少研究者充分借鉴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学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开展研究,使人们对中世纪早期的地中海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⑥新视角和新方法的引入也带来了史学研究方法的革新。这尤其体现在对中世纪早期地中海世界史料的解读上。自19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中世纪早期地中海东部的希腊与史学和地中海西部的拉丁语史学往往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大多数学者认为,中世纪早期拜占庭帝国相对稳定繁荣,那里的希腊语作家们继承了古典希腊史学传统,他们的记载被认为是严谨的、理性的,并且具有科学性。而同一时期地中海西部则仍然处于西罗马帝国衰亡后的蛮荒时期,尽管当时西欧各地的拉丁语作品保存了这一时期政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信息,但研究者们往往认为这些作品总体上来说仍然是较为原始、粗糙的史学作品,并且在浓厚的基督教世界观影

响下,充斥着大量在现代历史学家看来不可靠的神迹描写。对中世纪早期地中海世界史学的这种传统看法在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中有经典表述:

拜占庭历史学家对希腊典范坚持不懈的研究并不是仅仅教给他们模仿古代形式的技术,他们还从中学到了一些别的东西:谨慎的,一丝不苟的研究方法。许多拜占庭历史学家的著作都有科学价值。不过,最显著的事实是他们研究的多样性,他们进行的判断和批评的合理性。幸而东方教会不像西方那样占据统治地位。拜占庭那些历史家并未从《圣经》历史中找出虚假的类比,也没有从创世或洪水时代下笔写世界史,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时代的历史。^⑦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世纪早期西欧史学界开始对这一时期的史料进行重新评价。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沃尔特·高法特在《蛮族史的叙事》一书中的观点,他在该书中对约尔达内斯的《哥特史》、都尔主教格列高利的《法兰克人史》、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和执事保罗的《伦巴德人史》这四部中世纪早期西欧最重要的民族史学作品进行了分析,较为有力地论证了这些作品使用了丰富的修辞技巧,其背后往往隐含着作者的立场,并非如过去的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原始粗糙的作品。^⑧与此同时,拜占庭史的研究者也开始反思这些史料记载中所蕴含的意图和文化内涵,重新评估这些重要的史料中对瘟疫的记载。米沙·迈耶等学者认为,普罗柯比对查士丁尼瘟疫的记载并非是对疫情完全真实的描述。他的描述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雅典瘟疫段落为模板,并且试图像修昔底德一样通过疫情来表达对当时社会状况和人类命运的看法。^⑨当今学界对这些中世纪早期地中海地区史料的新认识,也使查士丁尼瘟疫研究有了新的意义。

总而言之,查士丁尼瘟疫是一场波及整个地中海地区的瘟疫,其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地中海东部。查士丁尼皇帝统治时期规模浩大、旷日持久的再征服战争(533-554)以及554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

的普世性的宗教会议进一步加强了整个地中海世界之间的联系,但同时,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使瘟疫很快蔓延到了地中海西部地区,对西欧各地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近年来的古DNA研究已经证实查士丁尼瘟疫曾传播到不列颠的情况。^⑩因此,考察地中海西部对查士丁尼瘟疫的认知和反应,对于我们了解这场瘟疫的全貌及其对中世纪早期西欧社会发展的影响有着重要意义。学术界近几十年以来对中世纪早期西欧史学的重新评价也提醒我们有必要深入考察这些史学作品中对查士丁尼瘟疫的记载情况。因此,研究地中海西部查士丁尼瘟疫的相关记载,同样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中世纪早期西欧史学作品“原始、粗糙”的刻板印象,认识到这些作品的史学价值。

本文将主要视角集中在中世纪早期(即公元6—8世纪)的地中海西部,通过这一时期西部作家对疫情的记载,考察瘟疫在地中海西部的传播及其影响,并借此来分析中世纪早期西欧基督教史学中“瘟疫书写”独特的史学价值,以期对迄今为止有关查士丁尼瘟疫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补充。

二、基督教史观与地中海西部的瘟疫书写

当代研究者们普遍认为,这场肆虐地中海世界的瘟疫最初于541年暴发于埃及小城佩鲁希昂,不久之后便席卷了整个地中海东部。542年,瘟疫传入地中海西部。西西里岛上的墓志铭记录了地中海西部最初受害者的情况。543年,罗马城和意大利北部也出现了有关瘟疫的记载。^⑪瘟疫传播至地中海西部的这一南一北两条路线,与哥特战争期间拜占庭军队进军意大利的路线一致。此后根据各种史料的记载,瘟疫在地中海西部的各地反复暴发多次,一直持续到公元8世纪才逐渐停止。^⑫记载地中海西部瘟疫的史料主要来源于三位作家:6世纪的高卢作家都尔主教格雷戈里在《法兰克人史》等作品中留下的高卢各地瘟疫暴发的记录;8世纪的意大利作家执事保罗在《伦巴德人史》中描述了此前两个世纪内意大利所蒙受的灾难;与他同时代的比德在《英吉利教会史》

中记载了不列颠地区的疫情。

这三位作家一般被认为是中世纪早期“民族”史学的代表人物。^⑬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地域和时代背景,但有着共同的拉丁基督教文化根基,因此他们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三个可供比较的视角。

8世纪的意大利作家执事保罗在《伦巴德人史》中记载了公元6—8世纪期间意大利地区的三次大规模疫情。^⑭其中描述最具体的是6世纪末瘟疫肆虐意大利北部的情形:

突然在屋子上、大门上、器具上和服装出现了许多记号,如果有人想洗去这些记号,反而会让它们越来越明显。在一年之后,人们的腹股沟以及其他隐秘之处会出现肿块,随后便是无法忍受的高烧,三天之后人就死了……前一天村庄中的人群还熙熙攘攘,而到了第二天,所有人都离开了,只剩下极度的寂静。子女们丢下父母未曾掩埋的遗体逃走,父母则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抛下高烧不退的子女,偶尔有一些人出于亲情的长久羁绊而留了下来埋葬自己亲人的遗体,但当这些人为亲属举行葬礼时,自己也倒下,留下了他们无人掩埋的遗体。^⑮

保罗对瘟疫症状的描述可以和同一时期地中海东部作家的记载互相印证,普罗柯比、阿加提阿斯和埃瓦格里乌斯等拜占庭史学家都提到病人最明显的症状是腹股沟的肿块和发烧。另一位6世纪的史学家则提到,人们往往在高烧两三天之后去世,这些和保罗的描述十分相似。^⑯因此,大致可以确定保罗记载的正是当时肆虐地中海东部的查士丁尼瘟疫的典型症状。然而,保罗对瘟疫的描述与一些地中海东部作家的记载也存在着一一定的差异。

同一时期地中海东部使用希腊语作家多少都受到古典希腊史学传统,尤其是修昔底德笔下“雅典瘟疫叙事”的影响。普罗柯比并不满足于人们将瘟疫与基督教世界观或者星象联系起来看法,他在描述各地的疫情和症状时,尝试从医学角度对查士丁尼瘟疫进行解释。^⑰与普罗柯比同时代的另一位

拜占庭史家阿加提阿斯同样提到,当时有人认为这场灾难源于天文星象的异常活动或上帝的愤怒,但他本人接着声明:“对于我当前(对瘟疫)的论述,这些解释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关联。历史写作的法则要求我的是对事件的陈述,更确切地说是对事件的总结。”^⑧

地中海西部的基督教作家对历史写作的理解显然和普罗柯比、阿加提阿斯这样的东部历史学家不同。保罗的记载有着浓郁的基督教末世论色彩,体现了《圣经》文学传统的影响。在保罗看来,这场灾难缘起于上帝对罗马人的愤怒。瘟疫暴发之前的记号对应的是旧约中逾越节的记号,而在瘟疫过后,保罗描述的场景就好像是《启示录》中的画面:“有战士们的号角声日夜地回响着。许多人听到有声音就好像一支军队走过。但实际上没有任何过客,也没有任何杀戮,满眼望去只有人们的尸体。”^⑨宗教信仰是保罗最关注的主题之一。对他来说,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是基督教信仰的见证,瘟疫同样是展现信仰虔诚与否的试金石。因此,在接下来描述590年罗马城中瘟疫的段落中,保罗运用了相同的笔法,将瘟疫与基督教世界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台伯河的河床上出现了许多蛇,还有一条巨大的龙,它们穿过城市进入了海里。在洪水之后便是一场十分严重的瘟疫,它大量地夺去了人们的生命,以至于无数人中只有一小部分幸存了下来。^⑩

教宗大格雷戈里组织罗马城内的人们举行了一次环城游行,并不断唱诵圣咏,这才平息了疫情。^⑪这场瘟疫在罗马城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中世纪的人们将大天使降临在哈德良皇帝陵墓上的传说和这次灾难联系起来:

瘟疫仍然在罗马城中肆虐,教宗格雷戈里率领着游行队伍唱诵着圣咏在城中巡回……这时,他看到一位天使站在克雷辛齐家族的城堡上,擦拭利剑上的血迹,随后收剑入鞘。教宗知道这预示着瘟疫的结束,事实也的确如此。此

后,这座城堡就被称为圣天使堡。^⑫

6世纪的高卢作家都尔主教格雷戈里补充了保罗有关罗马城瘟疫暴发的记载,将疫情和《以西结书》中的预言联系在一起,并且提到同一时期巴黎、普瓦提埃、都尔、克莱芒、勃艮第等地的情况。^⑬他收集了高卢地区的疫情信息,并认为马赛是瘟疫进入高卢的重要入口。病人的症状与此前地中海东部的记载十分相似:“病人在鼠蹊或胳肢窝的地方出现了一块伤患,就好像让蛇咬了似的,得了这种伤害的人立刻被病毒所毁灭,到第二天或第三天就断气了。”^⑭与保罗一样,格雷戈里关注的并不是对这种疾病的确切描述,而是如何通过这场灾难来宣扬基督教的信仰。543年瘟疫侵袭克莱蒙时,格雷戈里记载了主教加路斯通过虔诚的祷告拯救城市民众的事迹。然而在571年,瘟疫再度来到这里,此时担任主教的考提努斯在信仰上并不如前任加路斯那样坚定,他为了逃避瘟疫东躲西藏。此后克莱蒙城中大半百姓们都被瘟疫夺去了生命,而主教本人最终也难逃厄运,染上了瘟疫而去世。

和居住在蒙特卡西诺修道院中写作的保罗不同,作为主教,格雷戈里有着更为强烈的现实关怀。他的“瘟疫书写”并不仅仅旨在说教,也隐含着他在高卢政治和家族斗争中的立场。那位拯救克莱蒙的主教加路斯正是他的叔叔,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便是那位信仰不坚定的坏主教考提努斯及其家族。^⑮瘟疫暴发期间,勃艮第国王贡特拉姆和纽斯特里亚国王希尔佩里克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更明显地体现了格雷戈里作品的意图。他笔下的好国王贡特拉姆为了平息瘟疫,召集所有人在教堂中进行祷告,并且向民众施舍财物,虔诚的信仰甚至使国王斗篷的碎片也拥有神奇的能力,治愈了一个男孩的疾病。^⑯坏国王希尔佩里克则被格雷戈里称为“我们时代的希律和尼禄”,他只关心修复罗马时代的剧场,并且恢复古代的异教信仰,纵容行巫术的骗子,阻挠教士们的祷告。^⑰希尔佩里克在瘟疫期间的作为只是他坏国王形象的一个注脚。实际上,在这位国王统治期

间,格雷戈里本人的主教职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②当他开始撰写《法兰克人史》时,希尔佩里克已经去世多年,而贡特拉姆当时仍然健在,且是高卢最有实力的统治者之一。对格雷戈里来说,对疫情的记载不仅宣传了基督教的信仰,实际上也是他表达自身政治立场的重要手段。

由于当时频繁的人口流动,瘟疫很快从高卢传入了不列颠。^③比德在《英吉利教会史》中也有大量以瘟疫为主题的描写。他记载了公元7世纪不列颠各地瘟疫肆虐的情况:

先是毁灭了不列颠的南部地区,接着又侵袭了诺森伯里亚地区。然后迅速蔓延,持续多时,使无数人陷入惨遭毁灭的境地……这场灾难还使爱尔兰同样遭到了浩劫。^④

坎特伯雷大主教、肯特国王、诺森伯里亚主教以及国王的前妻都在这场瘟疫中染病而亡。^⑤许多修道院都出现了修士或修女集体染病的情况。^⑥尽管比德很少提及平民百姓的状况,但从他列举的这些事例便可以了解当时疫情蔓延的程度。不过,比德没有像保罗那样将瘟疫看成是上帝对世人的怒火,也没有像格雷戈里那样专注于描述恶人在瘟疫中所遭受的报应。比德“瘟疫书写”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并没有迎合此前基督教史学传统,将瘟疫看作是上帝对世人的惩罚。^⑦这一方面符合他本人在前言中所阐述的写作意图,即尽可能记载善人善行,以此来激励读者们见贤思齐。^⑧另一方面,这也与《英吉利教会史》的整体基调有关。比德在这部作品中描述了不列颠地区基督教会的发展历程。支持罗马教会礼仪传统的“罗马派”和支持凯尔特教会礼仪传统的“凯尔特派”教士们之间的矛盾是整部作品的一大主线。比德试图呈现给读者的是英吉利教会在“罗马派”教士们的努力下逐渐走向统一的图景。664年的惠特比宗教会议是全书的高潮,也是“罗马派”胜利的标志性事件,从此以后整个不列颠地区的教会都逐渐接纳了罗马教会的礼仪传统。^⑨然而,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瘟疫席卷了整个不列颠地区,导致许多

“罗马派”教士罹难。比德并不讳言这场灾难所造成的严重影响,但他笔下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是积极向上的,与保罗和格雷戈里笔下衰败、混乱的时代图景有着明显的差异。比德对坎特伯雷大主教狄奥多尔在位时期整个不列颠地区情况的评价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英吉利人来到不列颠后,没有出现比这更幸福的时代了:他们的国王英勇无比且笃信基督;所有野蛮民族对他们都望而生畏;人人都专注于新近传来的有关天国的佳音;如果有人想学习《圣经》,随时都可以得到名师的指导。^⑩

当坎特伯雷大主教多斯德迪特在瘟疫中去世后,狄奥多尔受罗马教会的委派接替了他的职位,狄奥多尔在位期间实际上正是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但对比德来说,这却是不列颠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对比德来说,瘟疫并不是上帝的惩罚,只是英吉利教会虔诚信仰的试金石。

三、瘟疫书写之外的现实:中世纪早期地中海西部疫情的规模与影响

保罗、格雷戈里和比德的作品都展现了中世纪早期西欧基督教世界中人们对瘟疫的认知。在大规模的灾难面前,《圣经》文学传统中的末世观念、教会史传统中的基督教胜利主义,以及基督教语境下的善恶有报思想是当时人们理解和解释瘟疫的主要方式。与此同时,这三位作家的“瘟疫书写”又往往与各自所处的时代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中包含着作者本人的立场和撰写意图。

有研究者认为,这三位作家的视野和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瘟疫书写的史料价值,无法根据他们的论述对地中海西部疫情的规模 and 影响做出更为可靠的总结。^⑪

然而结合现代的考古学和科学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地中海西部文献虽然有着浓厚的中世纪早期基督教史学的修辞特色,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提供了一些有关地中海西部疫情准确可靠的信息,是我们了解查士丁尼瘟疫对地中海西部影响的重要窗口。

从这三位作家的记载中能大致看到这场瘟疫波及的范围。格列高利记载的最为详细,他不仅提及了高卢,也提到了瘟疫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暴发的情况。麦克考米克统计了格列高利记载的疫情与东部疫情暴发的年份,他认为格列高利一共记载了6次较大规模的疫情,第一次疫情暴发于543—547年,格列高利提到瘟疫“在许多地区大肆猖獗,阿尔勒主教区疫情尤其严重”(4.5)。第二次疫情暴发于571年,瘟疫在奥弗涅和克莱蒙地区肆虐(4.31)。第三次疫情暴发于582年,格列高利提到“鼠蹊病症在纳尔旁大肆猖獗”(6.14);第四次疫情暴发于588年,“马赛被鼠蹊感染的疫病所蹂躏”(9.21),据格列高利记载,这次疫情暴发源于一艘来自西班牙的商船。第五次疫情暴发于590年,“瘟疫猖獗于维维埃尔和阿维尼翁城”。(10.21)与此同时,意大利的罗马城也暴发了严重的疫情(10.1)。③虽然图尔主教格列高利在记载疫情的内容中有着个人立场和说教色彩,但他对查士丁尼瘟疫症状的观察与描述并不缺少准确性,从上文中也可以看到,格列高利对瘟疫症状的记载可以和东部作家普罗柯比对症状的描述互相印证。同样,通过执事保罗的记载,可以统计出公元6—7世纪疫情在意大利的六次较大规模的暴发。第一次疫情出现在565年的利古里亚(2.4)。第二次则是590年在罗马暴发的疫情,他的记载可以和格列高利互相印证(3.24)。保罗提及的第三次大规模疫情于593年发生在拉文纳、格拉多和伊斯特里亚(4.4)。他记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疫情于680年暴发于罗马(6.5)。

比德提及了公元7世纪瘟疫在不列颠各地暴发的情况,虽然比德没有将视角聚焦于普通民众,但从他的记载中可以看到,英吉利各地的修道院受到沉重的打击,可见即便是生活条件较好的上层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也饱受瘟疫的侵扰。

总体上来说,格列高利的记载主要集中于对城市情况的描述,比德注重修道院的情况,而保罗相对简短的记载则反映了瘟疫对农村的影响。这三位作家从不同的视角呈现出这场瘟疫对地中海西部社会

全方位的影响。此外,这些作家疫情记载中一些看似充满宗教想象的段落,实际上在现代科学中也已经得到解释。比如,保罗和格列高利都提到,在疫情暴发期间房屋或者其他器具上出现了记号,现代科学认为是富含铁元素的空气与水相遇而产生的化学反应。④

这场瘟疫影响了西欧各地的政治局势。执事保罗提到,在6世纪后期的瘟疫结束后,意大利又遭遇了一场饥荒,处于极度衰弱的状态,这导致罗马和拉文纳之外的各个城市无力抵御伦巴德人的进攻。⑤伦巴德人的到来削弱了拜占庭在意大利的统治,也导致罗马教会与法兰克王国的统治者合作,从而影响了整个地中海西部的历史进程。比德则记载了瘟疫暴发期间不列颠地区一些皈依基督教不久的统治者抛弃了这一信仰,再度回归到自己的传统宗教中,从而加剧了政治上的分裂。⑥

与政治上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相比,这场瘟疫对中世纪早期西欧的社会制度的变迁可能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瘟疫进一步对罗马帝国时代的奴隶制传统造成了打击。大量奴隶在疫情暴发期间摆脱了束缚,成为拥有一定自由的雇佣劳动力。公元6世纪和7世纪西欧各个王国的法律都提及了这一情况。这些奴隶逃离原来的土地后很容易在其他地方找到有报酬的工作。在西班牙地区西哥特王国的法典中,统治者曾经试图禁止逃亡奴隶被雇佣:

如果一个逃亡的奴隶说他是自由的,倘若他没有被认出来,倘若在一位自由人的家里,他获得了有报酬的雇佣,那么这位自由人不能被指控,因为他不知道这涉及奴隶逃亡的问题。而如果奴隶被认了出来并且被带回到主人那里的,那么主人应该获得那份报酬。⑦

这条公元7世纪的法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有奴隶在逃亡后隐姓埋名成为自由劳动者。但是禁令的效果可能并不理想,以至于公元8世纪初,西哥特统治者不得不通过更为严苛的法律遏制奴隶的逃亡:

此前的法律中已经明确规定,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和调查可以惩治奴隶的秘密逃亡。但是,他们在法官面前以各种法律上的借口,或通过欺骗他们的庇护人,他们的逃亡没有被揭发。法律的执行变得困难,而且随着逃亡人数的增加,藏匿他们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以至于这一恶行发展到了如今的程度,几乎任何城镇、城堡、农庄或村落都存在着许多逃亡的奴隶。^④

意大利伦巴德诸王国的法律中也提及了很多类似的情况。奴隶们不仅大规模地逃亡,还聚集起来袭击各地的村庄,并且释放当地的奴隶。一些奴隶在和主人争斗之后前往别处定居。许多居住在意大利北方的奴隶逃到了南部。^⑤

中世纪早期的法律文献反映了瘟疫造成的社会动荡,也表明当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从长远来看,劳动力的短缺有利于劳动者地位和待遇的提升,也是中世纪早期西欧奴隶制消亡过程中的积极因素。瘟疫期间,西欧各地的人们往往抛弃一些较小的定居点,前往大城镇寻求救助。人口流动也造就了一些新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比如,从比德的《修道院长列传》中可以看到,公元7世纪末开始,诺森比亚王国迎来了一段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时期。韦尔茅斯和贾罗修道院在这一时期产生了诸多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作品,而修道院的规模也已经发展到一度有600多名修士,这是因为在此之前,一些较小的修道院因为瘟疫而遭到严重的损失,幸存下来的人们往往聚集到大修道院寻求庇护。^⑥当然,由于史料的局限,我们无法了解瘟疫在地中海西部传播的全貌,但结合中世纪早期历史学家的记载和同时代的相关文献,多少能够从一个侧面了解这场从地中海东部传播而来的瘟疫在西欧各地所造成的影响。

结语

本文从传统的历史学视角出发,通过这一时期地中海西部的史学作品对查士丁尼瘟疫的记载,考察了基督教史学作品对这场大规模瘟疫的解读。然

而对查士丁尼瘟疫的研究不仅限于对文本史料的解读,历史学与考古学、生物学等多学科的合作是今后该领域研究的主要趋势。随着科技的进步,有关这场瘟疫的非文本资料已经日益获得研究者的重视。罗马史和拜占庭史的研究者已经试图从更加长时段的视角来解读公元3世纪以来整个地中海世界的气候、疫情与罗马帝国衰亡之间的关系。^⑦而中世纪早期西欧各地城镇遗址和墓葬的考古报告也为地中海西部的情况提供了更多的线索。^⑧查士丁尼瘟疫对地中海文明历史进程的影响至今无法确切地评估,但日益丰富的多学科方法和多元化的研究视角显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这并不只是一场局限在拜占庭帝国的灾难,它在地中海东部地区以外造成的影响,仍然有待于研究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释:

① Merle Eisenberg, Lee Mordechai, "The Justinianic Plague and Global Pandemics: The Making of the Plague Concep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25(2020), pp. 1632—1667.

② 有关查士丁尼瘟疫的持续时间的考证,参见 Michael McCormick, "Toward a Molecular History of the Justinianic Pandemic," in L. K. Little ed., *Plague and the End of Antiquity: The Pandemic of 541-750*, Cambridge: 2007, pp. 290—312.

③ 参见陈志强、武鹏:《现代拜占廷史学家的“失忆”现象——以“查士丁尼瘟疫”研究为例》,《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④ Mischa Meier, "The Justinianic Plague: An Inconsequential Pandemic? A Reply," *Medizinhistorisches Journal*, Vol. 55, no. 2(2020), pp. 172—199; Mischa Meier, "The Justinianic Plague: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andemic in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 and its cultural and religious effects," *Early Medieval Europe*, Vol. 24, no. 3(2016), pp. 267—292; 陈志强:《地中海世界首次鼠疫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陈志强:《“查士丁尼瘟疫”影响初探》,《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陈志强、武鹏,《现代拜占廷史学家的“失忆”现象——以“查士丁尼瘟疫”研究为例》,《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等。

⑤ 参见 J. N. Biraben, J. Le Goff, "La Peste dans le Haut

Moyen Age,"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Vol. 24 (1969), pp. 1484—1510; Michael McCormick, "Gregory of Tours on Sixth-Century Plague and Other Epidemics," *Speculum*, Vol. 96(2021), pp. 38—96。

⑥有关“古代晚期”这一学术概念及其产生的学术背景,参见陈志强:《古代晚期研究:早期拜占庭研究的超越》,《世界历史》2014年第4期;李隆国:《古代晚期研究的兴起》,《光明日报》2011年12月22日,第11版;伊恩·伍德:《西部罗马的转型》,刘寅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32—154页。

⑦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30页。

⑧Walter Goffart, *The Narrators of Barbarian History, A. D. 550—800: Jordanes, Gregory of Tours, Bede, and Paul the Deac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⑨Mischa Meier, "Beobachtungen zu den sogenannten Pest-schilderungen bei Thukydides II 47—54 und bei Prokop, Bell. Pers. II 22—23," *Tyche*, Vol. 14(1999), pp. 177—210; James Gilmer, "Procopius of Caesarea: A Case Study in Imperial Criticism," *Byzantine Symmetica*, Vol. 23(2013), pp. 52—54.

⑩Michael McCormick, "Gregory of Tours on Sixth-Century Plague and other epidemics," *Speculum*, Vol. 96(2021), p. 48.

⑪Dionysios Stathakopoulos, "Crime and Punishment: The Plague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541—749," in L. K. Little ed, *Plague and the End of Antiquity: The Pandemic of 541—750*, pp. 99—102.

⑫Dionysios Stathakopoulos, "Crime and Punishment: The Plague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541—749," in L. K. Little ed, *Plague and the End of Antiquity: The Pandemic of 541—750*, pp. 104—105.

⑬Walter Goffart, *Narrators of Barbarian History*(A. D. 550—800), Jordanes, Gregory of Tours, Bede, and Paul the Deacon. pp. 3—5; Deborah Mausekopf Deliyannis ed, *Historiography in the Middle Age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3, pp. 43—87.

⑭Paul the Deacon, *Historia Longobardorum*, 3. 23—3. 24, 4. 14, 6. 5, in Pauli *Historia Langobardorum*, L. Bethmann and G. Waitz eds,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Scriptores Rerum Langobardicarum*, Hanover, 1878.

⑮Paul the Deacon, *Historia Longobardorum*, 2. 4.

⑯Procopius, *History of Wars*, 2. 22—23, in Procopius, Pro-

copius, 6 Vol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 B. Dewing,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4—1940; Agathias, *Histories*, 5. 3. 10, in Agathias, *Historie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short explanatory notes by Joseph D. Frendo, Berlin: De Gruyter, 1975; Evagrius Scholasticus, *Historia Ecclesiastica*, 4. 29, in Evagrius Scholastic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 translated by Michael Whitby,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00.另参见陈志强:《地中海世界首次鼠疫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⑰Procopius, *History of Wars*, 2. 22. 1—5.

⑱Agathias, *Histories*, 5. 3. 10.

⑲Paul the Deacon, *Historia Longobardorum*, 2. 4.

⑳Paul the Deacon, *Historia Longobardorum*, 3. 24.

㉑Paul the Deacon, *Historia Longobardorum*, 3. 24.

㉒Jacobus de Voragine, *Aurea Legenda*, 46, in *The Golden Legend: Readings on the Saints*, translated by Ryan William Grang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罗马城瘟疫与大天使降临的传说参见 Louis Shwartz, "Gargano Comes to Rome: Castel Sant' Angelo's Historical Origins,"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64, no. 3(2013), pp. 453—475。

㉓Gregory of Tours, *Historia Francorum*, 10. 1, in Bruno Krusch and Wilhelm Levison eds., *Gregorii Episcopi Turonensis Libri Historiarum X,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Scriptores Rerum Merovingicarum*, Vol. 1, Hannover: Impensis Bibliopolii Hahniani, 1884.

㉔Gregory of Tours, *Historia Francorum*, 4. 31;参见Procopius, *History of Wars*, 2. 22. 1—5。

㉕Gregory of Tours, *Historia Francorum*, 4. 5, 4. 31.

㉖Gregory of Tours, *Historia Francorum*, 9. 21.

㉗Gregory of Tours, *Historia Francorum*, 6. 46.

㉘Gregory of Tours, *Historia Francorum*, 5. 47—5. 49.

㉙Michael McCormick, "Gregory of Tours on Sixth-Century Plague and Other Epidemics," *Speculum*, 96(2021), pp. 74—75.

㉚Bede, *Historia Ecclesiastica*, 4. 27, in Bertram Colgrave and R. A. B. Mynors eds, *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9.

㉛Bede, *Historia Ecclesiastica*, 4. 1, 4. 19.

㉜Bede, *Historia Ecclesiastica*, 3. 23, 4. 7—4. 8.

㉝比德之前的不列颠历史学家吉尔达斯(Gildas)就将瘟疫

看成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参见 Gildas, *Excido Britannia*, 22, in *Gildas: The Ruin of Britain and Other Work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Winterbottom, Chichester: Phillimore & Co. Ltd, 1978.

③Bede, *Historia Ecclesiastica*, praefatio.

④Bede, *Historia Ecclesiastica*, 3. 25.

⑤Bede, *Historia Ecclesiastica*, 4. 2.

⑥Lee Mordechai, Merle Eisenberg, "Rejecting Catastrophe: The Case of the Justinianic Plague," *Past and Present*, Vol. 244, no. 1(2019), p. 14.

⑦Michael McCormick, "Gregory of Tours on Sixth-Century Plague and Other Epidemics," *Speculum*, Vol. 96, no. 1(2021), p. 66.

⑧Paul the Deacon, *Historia Longobardorum*, 2. 4; Gregory of Tours, *Historia Francorum*, 4. 5; Paul Edward Dutton, "Observations on Early Medieval Weather in General, Bloody Rain in Particular," in Jennifer Davis and Michael McCormick eds, *The Long Morning of Medieval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2016, pp. 167—180.

⑨Paul the Deacon, *Historia Longobardorum*, 2. 26.

⑩Bede, *Historia Ecclesiastica*, 3. 30.

⑪Lex Visigothorum, 9. 1. 12, in Karl Zeumer ed, *Leges Visigothorum*, *Monumenta Germania Historica*, *Leges nationum Germanicarum*, Vol. 1, Hannover: Impensis Bibliopolii Hahniani,

1902; 参见 Pierre Bonnassie, *From Slavery to Feudalism in South Western Europe*, translated by Jean Burrel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49—50.

⑫Lex Visigothorum, 9. 1. 12.

⑬Leges Grimaldi, 1; Edictum Liutprandi, 44, 88, in Georg Heinrich Pertz ed., *Leges Longobardorum*,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Leges*, Vol. 4, Hannover: Hannover: Impensis Bibliopolii Aulici Hahniani, 1868.

⑭Bede, *Historia Abbatum Auctore Baeda*, 17, in Charles Plummer ed., *Venerabilis Baedae Opera Historica*, 2 Vols. 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6.

⑮Kyle Harper, *The Fate of Rome: Climate, Disease, and the End of an Empi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Michael McCormick, "Radiocarbon Dating the End of Urban Services in a Late Roman Tow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16(2019), pp. 8096—8098; Alain Bresson, "Fates of Rome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110(2020), pp. 233—246.

⑯Michael McCormick, "Gregory of Tours on Sixth-Century Plague and Other Epidemics," *Speculum*, vol. 96(2021), pp. 38—96; Giovanni Zanchetta, Monica Bini, Kevin Bloomfield et al., "Beyond one-way determinism: San Frediano's miracle and climate change in Central and Northern Italy in Late Antiquity," *Climatic Change*, Vol. 165, no. 1(2021), pp. 1—21.

Plague of Justinian: The Epidemic in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and Christian Historiographies of Early Medieval Western Europe

KANG Kai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extending the conventional study focusing on the epidemic of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to that of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digs into records prepared by Paul the Deacon, Gregory of Tours and Bede who lived in Italy, Gaul and Britain respectively and tries to showcase how the narratives on the Justinianic plague in early medieval Western European Christian historiography matter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epidemics.